

国史学科建设的正式起步

——以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为中心的考察

王怀乐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西城 100009)

【摘要】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是国史学科发展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此次研讨会不仅为国史研究与编纂提供了明确指导,而且围绕编纂权威国史这一核心任务提出了各项工作安排。在当代中国研究所的组织协调下,各部门、各地区积极落实会议精神,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续编《当代中国》丛书,推进部门史与地方史研究,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推动国史学科建设迈上新台阶。会议也为当前推进国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关键词】国史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当代中国研究所

【中图分类号】D231;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24)01-0064-10

DOI:10.16223/j.cnki.cn61-1456/c.2024.01.005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科(以下简称国史学科)是与现实联系最为紧密的学科之一,也是史学学科中的后起之秀。一般来说,作为一种建制化的知识生产体系,学科的形成标志主要有三个方面:研究机构的设置、学术团体的成立以及学术刊物的创办。以这个标准来看,国史学科的正式形成是在20世纪90年代,包括1990年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成立,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的成立以及1994年《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创办。相应而言,真正意义上的国史学科建设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当前,关于国史学科的研究主要聚焦学科定位、基本任务、理论方法等方面^①,实际上重点仍然在国史研究上,对于国史学科史的关注比较少^②。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推进国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构建国史自主知识体系,都离不开对国史学科史的深入研究。特别是1990年在西安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以下简称研讨会),对国史学科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系统总结了以往国史研究与编纂工作的宝贵经验,又围绕“编纂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史”这一核心任务提出了具体设想与安排,为国史学科建设提供了正确的政治方向与明确的指导方针。可以说,这是一次承上启下的会议,也是国史学科建设的里程碑。然而,对于这一重要会议,学界除了个别成果有所提及之外,整体上关注极少^③。本文试以这次研讨会为中心作一历史考察,以期推进国史学科建设方面

【收稿日期】2023-12-16

【作者简介】王怀乐,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当代中国研究所当代中国政治与行政制度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研究”(21ZDA074)。

的研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 召开的背景与准备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编纂一部权威国史，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条战线经验、教训以“资政”，深入挖掘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伟大成就，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教材以“育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效应对各类错误思潮，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坚定对社会主义中国的信心以“护国”，越来越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为此，必须整合已有研究资源，大力推进国史学科建设。同时，随着《当代中国》丛书编写工作的顺利推进，相关国史研究成果的出版发行以及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成立，国史学科建设的条件也日臻成熟。在此背景下，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对推进国史学科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一）党和国家的重视与支持为国史学科建设提供政治保障

同党史一样，国史学科同样兼具政治性与学术性。因此，推进国史学科建设，既需要学术空间的保障，又需要政治方向的指导。“文革”结束后，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拨乱反正为国史研究提供了巨大空间，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便是20世纪80年代末出版的国史研究著作^④。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为开展国史研究提供了政治方向。

同时，决议的通过也意味着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经验的条件已经成熟。经胡乔木倡议，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当代中国》丛书编写工作于1983年正式启动。值得指出的是，这套丛书内容涵盖全国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既收集资料以修史存史，又总结经验以资政育人，如此庞大的规模若没有党和国家层面上的大力支持，很难动员起各方力量来参与。因此，这套丛书不仅是学术研究成果，更是党和国家集全党全国之

力推进的重大工程，是名副其实的“大兵团作战”，体现出党和国家对国史的高度重视。经过六七年的努力，《当代中国》丛书的编写不仅积累了大量资料，产出了《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当代中国的气象事业》等部分成果，还为国史研究培养、锻炼了一批人才，“它将为以后进一步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做好准备”^[1]。此外，早在1980年5月，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成立，加强了对健在老同志口述史资料的收集。实际上，这批老同志的亲身经历和掌握的宝贵史料，同样为国史研究与编纂提供了及时而珍贵的有力指导。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我国生产力获得极大发展，人们的生活工作方式与精神状态也发生深刻变化。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全国来看“效果还不够理想”^[2]¹⁴³。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以邓小平等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痛心疾首，深感过去最大的失误在于思想政治教育薄弱，因此，开展国史研究，加强国史教育，是十分必要的^[3]⁵¹。在这种背景下，推进国史学科建设更显育人的重要意义。

（二）国史研究的起步与发展为推进国史学科建设提供学术基础

国史学科不等于国史研究，但学科建设必须以学术研究为基础，因为只有有了明确的研究对象，才能科学厘定学科边界。毫无疑问，国史学科的研究对象就是1949年以来新中国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史研究几与国史同步，二者共进退。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便有《新中国是怎样诞生的》一书面世^[4]，此后几年时间里，该书经过数次增补，多次再版，1955年又以《新中国是怎样诞生和成长的》为名出版，将新中国史研究的时间段推进了一大步^[5]。同年，该书的删节本《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新中国五年简史》作为高中教材修订出版^[6]。此后，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7]《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4册）》^[8]等成果出版。同时，国史研究也纳入到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当中。1957—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先后原则通过、修订了《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草案）》^[9]，

这一草案提出了历史学的15个重要问题和23部重要著作，其中包括要编写国史。遗憾的是，除了部分工作得以开展外，这一规划在当时并未得到充分落实。总的来说，改革开放前的国史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整体上较为薄弱。

“文革”结束后，国史研究再度被提上日程。1978年1月11日，胡乔木在中国社科院制订科研计划和规划动员会上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现在还没有人着手认真地进行研究，要赶快着手研究^{[10] 517}。旋即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列入“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选题一百例”^{[10] 523}。4月，《一九七八——一九八五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纲要（初稿）》明确将国史研究列为22个历史学重点研究课题之一。此后，国史研究逐步开展起来。除了前文提到的《当代中国》丛书外，一些省份的专门史也有成果面世，如1985年贵州省冶金工业厅编写了《贵州省钢铁工业发展史1949—1984》等，高等院校先后开设国史课，报刊上也发表了一些文章，这对于推动国史的研究都是有利的条件^[11]。

在新中国成立40周年前后，出版了不少学术水平较高的新中国史研究成果，仅通史类的著作就有郭彬蔚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廖盖隆主编的《新中国编年史》、何理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及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949—1989年的中国》等。显而易见，新中国史研究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了^[12]。

（三）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成立为国史学科建设提供组织保障

学科关乎知识的建制化生产，因此学科建设需要以专门组织机构为依托，国史学科建设离不开国史专门工作机构的支持。早在1978年2月，胡乔木草拟的中国社科院《八年内拟新建的研究所（草案）》中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所^[13]。半年多后，国务院批准中国社科院成立现代史研究室，开展国史研究。实际上在研究室获准成立之前，胡乔木就曾布置相关人员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但由于当时的形势，这一研究并未成行^[14]。因而，现代史研究室的相关成果大

都集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是自然而然的了。1984年8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曾向院党组提出《关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专门研究机构的建议》，机构的名称可叫国史馆，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所，但从结果看这一建议并没有得到贯彻落实^[11]。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馆又提上日程，但由于当时条件暂不具备，故先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作为过渡。

1990年6月14日，杨尚昆、胡乔木、薄一波联名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打报告提出：“我国建国已40余年，建国以来的历史已占党的历史的大部分，而至今对于建国以来国家和党的历史的研究工作都极为薄弱。亟须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地予以加强。”^[15]6月28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圈阅同意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等同志也都在此前后圈阅同意。一个研究所的成立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批示，这在党史国史上是极少见的，也足见党和国家对这一机构的重视。

由于之前工作打下的良好基础，当代所成立初期虽条件简陋，但很快便从西安研讨会打开了局面。国史研究编纂与国史学科建设从此有了正式的专门机构。

二、研讨会明确国史学科建设的重点与方向

1990年12月1日—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在西安召开，此次会议由刚成立不久的当代中国研究所主办。会议重点关注国史研究、编纂与国史学科建设问题，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当代中国》丛书主编邓力群，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郑惠，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汝信，《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丁伟志等均就此问题发表讲话。《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成员吴家珣汇报了丛书编辑、出版的情况。此外，国务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当代中国》丛书主编马洪作了关于国家经济形势的报告。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李

彦作了书面发言。综合发言情况来看，此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国史工作重点的转变

这次研讨会是国史编纂工作的第一次会议，也是一次承前启后的会议，明确提出了国史学科建设的任务，并将国史学科定位提到了很高的位置。国史学科不是普通的学科，而是对党、国家、人民以至于对世界人民的命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学科。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定位，这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有着紧密的关系。特别是1989年政治风波的发生，“促使党更加冷静地思考过去、现实和未来”^{[16] 269}，更加深刻认识到加强国史教育的重要性。一方面，古人云，“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没有一部立得住的权威国史，对于维护国家统一与稳定是极为不利的，也会给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以生存空间。因此，国史研究与编纂有着“护国”的重要功能。另一方面，对于中国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等重大问题，都需要从历史中寻找依据，用充分的事实来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坚持，提升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因此，此时提出国史学科建设的任务，既是针对眼前形势的需要，又是针对国家长治久安的一项战略性安排。

当然，会议提出的国史学科建设，核心仍然是国史研究与编纂。以往国史工作的重心在于《当代中国》丛书的编写与出版，但此次会议明确指出，尽管此后国史研究与丛书编写两项工作都要进行，重心要转移到国史研究与编纂上来。其主要任务在于编写出一部权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也可以说是官修国史的正式开端。

（二）关于国史研究与编纂的工作要求

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只有具备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才能够使其与其他学科区别开来，也才有存在的必要性^[17]。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国史学科之所以能够立得住，除了本身具有重要作用之外，也在于其具有明确的边界。因此，国史研究与编纂，必须突出以下特点。

首先，国史研究是政治性与学术性的统一。国史研究的底色在于历史，因此研究国史必须充

分体现历史研究的基本特质，注重史料工作。一方面，充分利用《当代中国》丛书所积累的材料，整理和发掘档案材料，搜集已经出版的国史书籍；另一方面，还要充分搜集国外研究当代中国史的材料、书籍、文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供借鉴。国史的特色在于其具有突出的政治性，因此国史研究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把稳政治方向；研究国家学说、党的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不能只做简单的史实叙述^[18]。

其次，国史研究是基础型研究与应用型研究的统一。国史研究既要讲清楚“是什么”的问题，又要弄明白“为什么”的问题，从历史中获得规律性认识，由此既可以“为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历史的借鉴”，又可以“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丰富生动的历史教材”^{[19] 1}。因此，国史研究不光要追溯历史，还要联系实际，特别是要认真研究东欧剧变、苏联动荡的原因，汲取经验，吸取教训，提升中国人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信心。

最后，国史研究与党史研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史的任何一个阶段都与党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党史研究与国史研究存在一定的重合，但二者不可互为替代，否则国史便失去了其单独存在的意义。一方面，国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史，党的领导在国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因而研究国史要充分说明党如何领导国家步步前进；另一方面，国史侧重于国家政权建设，范围比党史要广，特别是对于人民群众的生活与面貌，这是党史所不能包办的。总之就是要正确处理党史与国史的关系，“党史归党史，国史归国史”，“不能把国史写成党史”^[18]。

（三）关于地方史的编写工作

地方史是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研讨会之前的几次《当代中国》丛书地方卷会议就考虑到了丛书编完的后续工作问题，认为不能“曲终人散”“人去楼空”，最初打算编写丛书地方卷的简明本，后来经过讨论改为编写地方简史。国史研究是一个宏大工程，需要全国各部门、各地方

共同协作，编写地方简史就是协作的开始，且若是地方简史工作做得好，可以为国史研究起到开路、先行的作用。

地方简史以省级行政区划为基本单位，是在《当代中国》丛书地方卷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地方简史的定位是一部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确定的地域性、严谨的科学性、精炼生动的可读性的历史读物。因此编写地方简史既要写人、写事，又要写过程、写面貌。在写人的时候，既要写正面人物，又要写反面人物；写事的时候夹叙夹议，突出重大事件的同时兼顾全局。写作时间下限为1990年^[20]。在实际的出版中，不少地方简史随着编写工作的推进，时间下限往后推移了数年。

最终，会议在讨论基础上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这一《纪要》强调了开展国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总结了国史研究与编纂已具备的成熟条件，重点围绕编写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从续编《当代中国》丛书、编纂地方简史、编写通用教材、成立国史学会等方面做出了详细安排。1991年3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人民政府，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军委总政治部，各人民团体转发了这一纪要。一次工作研讨会的纪要通过中办、国办发往全国，这在整个党史、国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也足见这一会议的重要性。

《纪要》在最后明确提出，全国各地、各部门所进行的国史研究工作，由当代中国研究所负责联系和协调。此次会议可谓当代中国研究所的“立所之会”，既明确了自身定位，又明确了中心任务。会后，国史研究和编纂工作开始步入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发展阶段，国史学科建设也伴随会议精神的落实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落实研讨会精神与开创国史学科建设新局面

研讨会虽然只有短短数日，但对国史学科定位、工作重点与要求等方面进行了详实讨论，并就为什么要做、为什么能做以及怎样做国史研究

等问题达成共识，为国史学科建设“正位”“定向”。对于国史学科建设来说，研讨会提供的不仅仅是“务虚”的原则、要求，更多的还是对会议纪要所提出各项工作的“务实”。在当代所的组织协调下，各部门、各地区积极落实会议精神，结合自身实际，进一步推进国史研究与编纂各方面工作，形成了“1+X”工作格局，极大推动了国史学科建设。

（一）立足中心任务，编写一部权威的新中国史
“1+X”工作格局当中的“1”就是《纪要》提出的要在尽可能快的时间内高质量编纂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是规定国史学科研究对象的根本性举措，也是当代中国研究所的中心任务。最初的打算是先写一部简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由于难度较大，因此改为编写多卷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21] 140。

1992年11月，当代所决定先写五卷本国史，即第一卷（1949—1956）、第二卷（1956—1966）、第三卷（1966—1976）、第四卷（1976—1991）、第五卷（1991—1994）。第一卷包括绪编，讲清楚新中国是从哪来的。后来编写计划有所调整，第一卷中的绪编扩展为序卷，第四、五卷也合并为第四卷（1976—1984）。

1996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编委会成立，从此国史稿编写有了更为明确的组织与指导。同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序卷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经过多轮编写修改，2007年，国史稿四卷形成了内部讨论稿。从2007年到2009年，编委会邀请了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单位的30多位领导和专家审阅内部讨论稿，并提出修改意见。各卷在充分吸收意见的基础上进行反复修改，形成正式送审稿。从2009年到2012年，中央组织和协调相关部委，先后三次审读送审稿，提出修改意见和补充建议。当代所和国史稿编委会对各卷进行了全面的审改，并于2012年形成呈报中央的“送审稿”^[22]。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四卷本）》连同序卷由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正式出版。作为国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同时也是国史领域的权威教材，

国史稿编写历时20年，凝聚了几代国史工作者的心血和智慧。

此后，当代所继续推进编写工作，目前已经完成国史稿第五卷（1984—1992）、第六卷（1992—2002）、第七卷（2002—2012）送审稿。近年来，当代所还组织编写出版了两本新中国简史权威读本，一为201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而编写的《新中国70年》（当代中国出版社2019年版），一为202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21年版），为国史宣传与教育提供权威教材。2021年，当代所正式启动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多卷本）”，除总论卷外，分别按1949—1956、1956—1966、1966—1978、1978—1992、1992—2002、2002—2012、2012—2022等时段划分各为一卷。时间范围上比国史稿更进一步，涵盖了新时代这十年。可以说，直到今天，当代所仍然在围绕此次研讨会关于编纂权威国史的要求接续奋斗，为推进国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二）广泛动员力量，续编出版《当代中国》丛书

虽然研讨会明确此后工作重心放在国史研究上，但对于《当代中国》丛书编写工作仍然提出要求，最迟要在1994年底全部出版^{[19] 2}。经过全国10万编研人员的不懈努力，《当代中国》丛书历时15年，到1998年基本完成，并于1999年6月出版了电子光盘版，比原计划晚了几年。

《当代中国》丛书共出版152卷，包括政治社会、政法、群众团体、对外交往、人事管理、工商管理、商业、经济、财政金融、基建、交通通信、能源、冶金和机械、化工和轻纺、国防工业、农业、科技、文教卫、传播、艺术、地方、国防与军事、专题类等23个大类。丛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内容，经济卷、部门经济卷和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写的地方卷加在一起，约占总卷数的一半^[23]。丛书收集、运用了各条战线、各个地区的大量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同时，丛书总

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条战线、各个地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过程、辉煌成就和历史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2020年，《当代中国》丛书续编工作正式启动，不仅要整体续编之前各卷，还根据国家发展、行政区划和机构变动的实际，计划增加编写数卷。这也将进一步丰富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历史的研究。

《当代中国》丛书收集了大量资料，为国史研究提供了史料基础。10万人规模的编写队伍成为国史学科建设的人才蓄水池，在当时尚无学位教育的情况下为国史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编写过程中各部门、各行业、各地方加强协作，为此后集中攻关重大课题提供了宝贵经验。

（三）拓展研究范围，推进部门史与地方史研究

国史通史离不开部门史、地方史的支撑。研讨会根据《当代中国》丛书的出版进度，要求已出版《当代中国》丛书行业卷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尽快就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问题提出本部门可以承担的专题，并陆续展开研究工作^{[19] 2}。例如，国家教委（教育部前身）党组根据《纪要》精神确定把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研究作为国家教委承担国史研究的任务，并于1994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研究工作小组。最初几年的工作重点在于积累资料，开展典型与专题研究，此后则集中力量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经过10多年的努力，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正式出版^{[24] 1126}。再如，在《纪要》发出后，原地质矿产部党组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史”项目立项，随后组成编纂委员会，原计划于1994年出版，后因各种原因未能按计划完成。1998年3月，原地质矿产部与国家海洋局等共同组建国土资源部。2001年后这一工作由国土资源部咨询研究中心继续完成，并于2003年正式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史》^{[25] 367}。

这期间当代所还组织召开过部门史研讨会，就部门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研究计划，各部委之间怎样加强协作、交流经验、互通信息进行了

认真讨论^[26]。通过讨论,各部门充分认识到部门史是整个国史的一部分,应该跟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编研步伐,以互为补充^[27]。

整体上看,部门史的研究更多依托各部门独立推进,地方简史的编写则不同。当代所在《纪要》转发后不久便开始组织地方简史的编写工作。1991年5月,当代所在郑州召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丛书第一次编写工作会议,首批与会的有12个省、直辖市。会议对地方简史的编写提出要求,一是要总体把握地方历史,不能只写经济建设,也不能只写政权建设;二是要突出特色,突出重点,不宜面面俱到;三是要史论结合,论述力求深入;等等^[28]。同年6月,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丛书编委会。1992年3月,当代所在武汉召开18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简史工作会议,实际上到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达到近30个。会议提出地方简史要做到“三满意”,即地方党委和政府满意,丛书编委会满意,最重要的是广大读者满意;做到“四个不一样”,即与地方志不一样,与《当代中国》丛书地方卷不一样,与地方党史不一样,与其他地方简史不一样。这之后当代所还曾多次召开简史编写工作会议,推动编写工作的开展。

各地也都成立相应编写组织。例如江西成立《当代江西简史》编委会,并于1991年6月召开第一次会议^[29]。河南成立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领导小组,同时在《当代中国丛书·河南卷》编辑部基础上设立国史研究室,作为领导小组的日常办事机构^[30]。四川社科院成立当代四川研究所,四川简史编辑部与研究所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28]。黑龙江、广西、浙江、贵州等地也都成立了当代地方研究所。

经过20多年的努力,当代地方简史丛书取得了丰硕成果。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996年到2008年,一共有24部地方简史出版,其中1997年出版的《当代四川简史》包含了重庆市内容,当年重庆市成为直辖市,2003年又有《当代重庆简史》出版。除重庆、黑龙江外,其他22部简史均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总之,部门史与地方史

的编写与出版,不仅为各部门、各地方保存史料,提供借鉴,而且还培养了一支规模庞大、领域宽广的国史研究队伍,这对于国史学科建设来说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四) 打造交流平台, 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

学会是构建学术共同体、促进学术交流的重要阵地,也是学科建设不可或缺的环节。研讨会提出以各地区、各部门《当代中国》丛书编辑人员为基础、当代中国研究所为骨干,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学会正式成立时名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学术讨论^[19]³。实际上,早在1990年6月2日邓力群给李鹏的报告中就提出“以各部门、各地方当代中国丛书编辑人员为基础,当代中国研究所为骨干,成立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学会,按照群众团体登记法,报请有关单位批准”^[31]。经过两年多的努力,1992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获批注册登记。12月,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当代所成立后主办的第一个以国史研究为己任的全国性的社团组织,其宗旨和任务是团结海内外一切从事国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和热心国史工作的人士,共同推进国史的研究、宣传和教育事业。

2022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成立3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指出国史学会“为推动新中国史研究、宣传和教育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32]。这是对国史学会工作的最大肯定。30多年来,国史学会凝聚起一大批国史研究者,极大促进了国史学术交流。

结 语

从会议共识和会议落实上看,国史研究与编纂都是重中之重,这对于国史学科建设同样有着重要影响。严格意义上来说,先有国史,后有国史研究,再有国史学科建设。因为研究可以是个体行为,上升到学科层面则是一种有组织的集体行为,要有阵地、有团队、有后备力量培养。此

次研讨会恰好处在从国史研究到国史学科建设的发展链条上。与以往相比,会后的国史研究有了统一的协调指导机构——当代中国研究所和学者交流的园地——国史学会,从而聚拢起一支庞大的国史研究队伍,他们成为了国史学科建设的中坚力量。在国史知识体系上,会后的国史研究融汇通史、部门史、地方史等,在史料积累与专题研究等方面不断产出新的成果。而且,研讨会的“后劲”一直持续到今天。时至今日,国史学科建设的诸多工作都能从30多年前的会议上找到依据,部分工作一直没有中断。

当然,推进国史学科建设是一项久久为功的事业,仅凭一次会议并不能够将学科建设的所有问题都解决。在学生培养方面,除了《纪要》中提到的国家教委选定北京大学等高校编写国史通用教材和有关参考资料外,会议对于学历学位教育暂未涉及。直到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依托当代中国研究所设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系,开始培养国史专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33]。此外,学刊是促进学术交流、推动学科建设的重要阵地。这次会议并未专门提及。早在1992年,成立不久的当代中国研究所与国史学会便申请联合创办公开出版的《当代中国研究》和内部出版的《国史研究参考资料》《国史研究通讯》,很快获得批准^[34]。内部出版的两种刊物一段时间后由于人手有限不得不停刊,《当代中国研究》则更名为《当代中国史研究》于1994年正式创刊。这是国内首家专门刊载当代中国史研究成果的杂志,直到今天《当代中国史研究》仍是为数不多的国史研究专业刊物。此外,个别期刊也设置了国史研究专题版块,如《党的文献》《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设置“党史新中国史研究”版块,《安徽史学》设置“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版块,但整体而言,国史研究领域的文章发表空间仍然十分有限,这也是制约国史学科建设的重要因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习党史、国史,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

修,而且必须修好^[35] 15—16。修好这两门课,离不开学科建设的支撑。从现有条件看,一是要做强国史学会,趁着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国史学会成立30周年贺信精神的“东风”,广泛建立各地区、各领域的分会,与已经建立的当代科技史分会、当代边疆史研究分会、农垦史研究分会等,定期举办学术交流,共同为国史学科吸引人才、凝聚人才、培育人才。二是要拓展发表空间,在国史研究的各领域探索创办学术刊物,为本学科的发展提供交流平台。可以先创办各个专题史的研究集刊,待条件成熟时再以此为基础创办正式公开的刊物^[36]。当然,学科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更加全面的顶层设计与制度发力,上述建议也只是针对个别问题而言。当前,“中共党史党建学”已成为一级学科,各个高校的党史党建学院、党史党建研究院纷纷成立,开展研究,招收学生。中国当代史(国史)仍是在中国史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新的学科格局正在形成,国史学科如何在这一形势下进一步明确自身特色,提升定位,仍然需要广大国史工作者的继续努力与探索。

注释:

- ①参见王炳林:《构建新中国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当代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1期;朱佳木:《当代中国史理论研究的学科建设及当前任务》,《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1年第5期;储著武:《新时代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科建设的思考》,《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2021年第6期;宋月红、王爱云:《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第2版)》,当代中国出版社2019年版;王海光:《史观、方法与中国当代史研究》,《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齐鹏飞:《关于“国史”研究和“国史”学科建设若干问题的再认识》,《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3期;等等。
- ②参见李正华、秦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科建设的缘起、发展与展望》,《河北学刊》2019年第5期;汪兵:《中国当代史学科体制化研究述略》,《广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等等。
- ③参见张星星:《学习国史,知史爱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共党史研究所编:《“四个自信”的启示与思考》,湘潭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0页;程中原:《信史立国 当代中国史研

究纵横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9—140页；宋月红、王爱云：《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第2版）》，当代中国出版社2019年版，第52—53页；等等。

④参见朱宗玉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郭彬蔚：《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河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参考文献：

- [1]《胡乔木传》编写组. 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续)[J]. 中共党史资料, 2007(2).
- [2]邓小平文选: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3]宋月红, 王爱云.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第2版)[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9.
- [4]廖盖隆. 新中国是怎样诞生的[M]. 上海: 海燕书店, 1950.
- [5]廖盖隆. 新中国是怎样诞生和成长的[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5.
- [6]廖盖隆, 编.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新中国五年简史[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5.
- [7]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 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8.
- [8]南开大学历史系, 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4册)[M]. 保定, 天津: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58, 1958, 1959, 1960.
- [9]努力实现哲学社会科学远景规划[N], 光明日报, 1957—06—23.
- [10]胡乔木传编写组. 胡乔木传: 下[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15.
- [11]储著武.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发展历程[J]. 安徽史学, 2021(1).
- [12]李文. 新中国史研究事业的兴起和繁荣[J].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2022(10).
- [13]《胡乔木传》编写组. 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一)[J]. 中共党史资料, 2007(1).
- [14]陈铁健. 历史家的品格 记黎澍师[J]. 百年潮, 1998(3).
- [15]杨尚昆, 胡乔木, 薄一波同志关于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建议[M]. 当代中国研究所所藏档案, 1990年第2号.
- [16]本书编写组, 编. 中国共产党简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21.
- [17]王炳林. 构建新中国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23(1).
- [1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材料之二: 邓力群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M]. 当代中国研究所所藏档案1991年第124号.

- [19]辽宁省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 编. 辽宁教育史志1996年第1辑[M]. 沈阳: 辽宁省新闻出版局, 1996.
- [20]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材料之三: 关于编写地方当代简史几个问题的汇报[M]. 当代中国研究所所藏档案, 1991年第125号.
- [21]程中原. 信史立国: 当代中国史研究纵横谈[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 [22]程中原. 风雨二十载 为共和国修史——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的新材料、新提法[N]. 北京青年报, 2013—03—22.
- [23]吴家珣.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出版工作的回顾[J]. 当代中国史研究, 1999(4).
- [24]何东昌, 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上、下卷)[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7.
- [25]朱训, 陈洲其, 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史1949—2000[M]. 北京: 地质出版社, 2003.
- [26]中华人民共和国部门史研讨会在京召开[J]. 当代中国史研究, 1995(4).
- [27]“中华人民共和国部门史研讨会”发言摘要[J]. 当代中国史研究, 1995(5).
- [28]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丛书编写工作会议纪要[A]. 当代中国研究所所藏档案, 1991年第212号.
- [29]当代江西简史编辑委员会正式成立编撰工作已全面展开[A]. 当代中国研究所所藏档案, 1991年第214号.
- [30]河南省委办公厅和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中办厅字[1991]13号文件精神的通知[A]. 当代中国研究所所藏档案, 1991年第214号.
- [31]邓力群同志关于当代所编制给李鹏同志并报国家编制委员会的信(1990年6月2日)[R]. 当代中国研究所所藏档案, 1990年第3号.
- [32]习近平致信祝贺国史学会成立30周年 强调坚定历史自信 增强历史主动 更好凝聚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N], 人民日报, 2022—12—09.
- [33]李正华, 秦颖.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科建设的缘起、发展与展望[J]. 河北学刊, 2019(5).
- [34]刘国新. 忆初创时期的《当代中国史研究》[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24(1).
- [35]习近平.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 [36]张金才. 近30年来中国当代政治史学科发展概述[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24(1).

【责任编辑 刘 滢】

Official Launch of the Disciplin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y of the PRC: A Study on the Symposium on the Compil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90

WANG Huail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Xicheng, Beijing 100009)

Abstract: The Symposium on the Compil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eld in 1990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of the PRC history, which not only provided clear guidance for the study and compilation of the national history, but also defined arrangements for the central task of the compilation. Under the organiz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and local governments, acting on the spirit of the conference, engaged actively in compiling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ser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promoted the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special sectors and localities, prompted the founding of the Association of National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advanced the disciplin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history to a new level. The conference has also offered great experience in developing the systems for fields of study, academia, and discourse of the discipline at present.

Key Words: discipline of the history of the PRC; Symposium on the Compil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上接第50页)

On Mao Zedong's Conception of "Revolutionary Party" and Its Implications

YANG Binbin, CHEN Yangkai

(1. Institute of Marxism,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Dongcheng, Beijing 100732; 2. School of Marxism,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Haidian, Beijing 100048)

Abstract: As a Marxist party, revolution is the defining nature of the CPC, and "revolutionary Party" is a symbolic concept in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 Party's political discourse system. Mao Zedong's conception of a "revolutionary party" was derived from profound theoretical origin, practical foundation, and historical motivation. This concept, an embodiment of adapting Marxist theories on political party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had taken shape and developed through the periods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and have made profound implications on founding, revitaliz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Party. In the new era, the Party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in self-reform and tackling the special challenges that a large party like the CPC faces, so as to escape the historical cycle of rise and fall; promote the great social transformation with strategic thinking, so as to create new ground for "Chinese miracles" and "Chinese governance"; advance reform of governance by applying systems thinking, so as to modernize China's system and capacity for governance.

Key Words: Mao Zedong; revolutionary Party;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proletariat; conception